

经典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化

朱绍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概念。处于发展中地位的落后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冷静认真地学习那些经过人类历史实践检验并得到人们公认的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避免现代经济学的教条主义。

[关键词] 经典经济学; 现代化; 经济发展; 教条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671-0398(2001)02-0013-03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Classic Econom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ZHU Shao-w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a historically developing concept. The backwar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must start from their own conditions when striving for modernization. The classic works on economics, which have experienced the practical test of human history and have acquired public acknowledgement, should be studied honestl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up our socialist marketing mechanism, the doctrinairism of modern economics should especially be avoided attentively.

[Key words] classic economics; moder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doctrinairism

笔者的专业是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目的在于寻求一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人类历史经验。笔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人类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就很难胸有成竹、有条不紊地制定健康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稳步迈进。然而“自然是不能飞跃的”,一国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不可能“飞跃”的。一声号令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沉痛教训,我想人们必定记忆犹新。

我们日常所用的“现代化”用语,当然是源于“modernization”的翻译,但是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本来“现代化”(modernizataon)是历史的发展概念,是指从中世纪走向近世纪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也就是从封建的黑暗的中世纪社会走向近代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在这里统治人们的“神权”和“君权”被推翻,而“市民阶级”作为新兴势力,形成了“人民政权”。所以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理解“现代化”的概念,应译为“近代化”更为合适。“近代化”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近代的产业资本从中世纪的封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使商业资本纳入于产业资本的循环运动中为生产

[收稿日期] 2001-05-18

[作者简介] 朱绍文(1915-),男,汉族,江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

资本的发展服务,而不再是从流通过程中吸取其利润,它只能从平均利润中获得它应得的份额。这样就能促进生产,壮大社会的财富。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人们称为“产业革命”,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阶级的抬头。

社会上往往将“现代化”的概念单纯地理解为“工业化”,这样就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即一定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性格和阶级内容。因为在封建统治社会里,也提倡“工业化”,也能实现“工业化”,这种“工业化”的力量反而会增强封建阶级的统治势力,巩固他们的地位,镇压下层庶民和工人、农民,这种“工业化”当然不是历史的科学意义的“近代化”。所以把“现代化”单纯理解为“工业化”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类所谓“工业化”,却带来了生态的灾难,江河的污染,都市不见天,地上垃圾堆,生民受涂炭,文化大倒退,这不是“近代化”而是大后退呢?!

笔者毕生所追求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化”的课题,是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寻求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走上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经过漫长岁月的探索,笔者坚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比喻是不适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去吸取人类历史的精神财富。人类历史上走上“近代化”的最典型的先进国家,也即最早从封建统治势力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的生产者阶级、工厂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推动“产业革命”的是英国。针对这个时代历史课题的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国富论》是反封建的,是发展新兴阶级生产力的“近代化”的理论武器。美国的加尔布雷思教授曾经赞扬《国富论》、《圣经》和《资本论》是人类的三大财宝。事实也是如此。《国富论》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的理论宝库。

但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和18世纪的英国一样,也面临发展本国产业资本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课题。当时,在强大的英国产业资本势力的进攻下,加上德国本身追随英国产业的德国北方的自由贸易的商业资本的泛滥,要发展德国的产业资本,推翻本国的封建势力,为德国的近代化而奋斗的德国的经济学家,就不能只依靠于引进英国的经济学来帮助德国的“近代化”,解决德国产业资本发展的

问题。针对祖国的现状和国情,为了祖国的利益和发展,伟大的爱国主义经济学家弗·李斯特(1789—1846)花了毕生的奋斗和心血,写了《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建立了从本国立场出发的“国民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本国创造财富的生产力。他认为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还更为重要。他的著作成为影响当时处于发展中国家如美国和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著作。李斯特也曾参加了当时美国发展国民经济和走向现代化的运动,写了《美国经济学大纲》。

处于发展中地位的落后国家,在要求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时候,必须冷静地认真学习那些经过人类历史实践检验并受人们公认的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有各种各样的流派,笔者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基本经济理论的武器。它们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学,也是“过渡时期”的理论武器。

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成熟,社会矛盾尖锐,新兴阶级的劳工大众的生产力受压的时代,我们就不能只满足于追求“产业革命”的“近代化”的理论指南,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解放工农大众的生产力的理论武器,也就必然要成为我们追求“现代化”的指南。由于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产业资本还很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学习亚当·斯密为英国和李斯特为德国的产业资本的发展所提出的基本理论,以追赶世界发达国家,但同时又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所招致的人们的苦难,所以,我们又必须以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基础,将斯密、李斯特和马克思这3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作为建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应参照的理论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亚当·斯密和李斯特的基础理论为建立国民经济的指南,发展生产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但由于19世纪的历史条件,日本不可能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导,虽然它也曾学习德国采取了许多社会政策,缓和国内矛盾,但却把矛头引向海外,走上了侵略邻国的帝国主义道路,最终也仍然要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所以,一个国家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3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3大经典都是不同

历史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实践检验。

人们可能还记得,英国产业革命前夜,为了英国的“近代化”向当时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行会等封建统治势力发动进攻的新兴势力,是英国当时的“中产阶层和下层人民”,也就是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的联合,经过艰苦斗争,才获得胜利。直到1832年英国选举法修改前为止,这两个新兴势力都是联合一致,向封建势力斗争的,但选举以后,只对第三阶级有利,迫使第四阶级离开。即使到了1846年为撤消谷物条例而斗争时,工人阶级还是和第三阶级站在一起,进行联合斗争而获得胜利。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直到增补“机械论”一篇以前,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这二者还一直和地主阶级的地租相对立,以后才逐渐出现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在我国的抗日战争年代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也一直和中国的工农大众一起,争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争取了推翻三座大山,获得全国解放革命战争的胜利。回顾中外为争取“近代化”斗争的历史,笔者深信在我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在建设祖国“国民经济”近代化的道路上,认真学习亚当·斯密、弗·李斯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加以消化,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亚当·斯密和弗·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并非如想像的那样只有根本对立而无相辅相成的一面。

笔者在专著《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写作中,避免用“古典经济学”的用语出于以下考虑。虽然“古典”和“经典”都是英文“classics”的汉译,其意义是相同的。但“古典派经济学”的概念并不一致,通常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以外,在英国往往还将马尔萨斯、J·穆勒、麦克库洛赫、J·S·穆勒等也归入“古典派经济学”,凯恩斯甚至将A·马歇

尔、艾奇威斯和庇古等也算做“古典”经济学派,而现代的西方新古典派的学者们,往往习惯直接简称他们为“古典派”。所以使用“古典经济学”的时候,往往会引起混乱。这里所使用的“经典经济学”是指成为人类财富的经济学的“古典”或“经典”的著作,而不是指“古典派经济学”的“古典”的汉译用语。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德国经济学中的最伟大的“古典”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人类的财宝,经典中的经典。正是为避免与“古典派”用语的混淆,才使用了“经典经济学”。

至于不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而直接用“现代经济学”,理由也很简单。过去在我国之所以加上“西方”字样,是为了标明其资产阶级的特征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现在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正努力地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不再认为它只是“西方”的而“东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用了,相反,学习“现代经济学”还是十分重要的学习经济知识和市场经济理论的手段。我国的报刊杂志、政府文件,到处都在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根本已不再表现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特征。如仍坚持旧有用语,反而会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混乱和画蛇添足之感。

然而,在肯定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应认真考虑到我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的特色,不可忘记经典经济学对我国走上近代化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同时对现代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美国金融资本世界经济霸权主义的糖衣炮弹,不能不予以警戒和批判。过去我们犯过生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今天我们应特别警惕避免犯现代经济学的教条主义。不加分析,不下苦功,不考虑本国实情,照抄照搬,必将危害国家的命运。

注:该文是朱绍文教授的《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一书的《自序》,文中特别强调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而要能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必须在继承“经典经济理论”的同时立足于本国的实际。征得作者同意,由其学生王明友节录于本刊刊载,以飨读者。